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研究系列

泾川佛教文化论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

“西有敦煌·东有泾川”

泾川是“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研究中心”

杨曾文/主编



人民出版社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研究系列

涇川佛教文化论

杨曾文/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泾川佛教文化论/杨曾文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01-013942-5

I. ①泾… II. ①杨…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研究-泾川县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774 号

泾川佛教文化论

JINGCHUAN FOJIAO WENHUALUN

杨曾文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插页:1
字数:262 千字

ISBN 978-7-01-013942-5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一：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泾川佛教文化论

泾川地处甘肃东部、陕甘交界处。建郡置县历史更迭 2100 多年，自古以来就是长安门户、丝路要冲，具有“拱卫关中”的战略地位，也是我国多民族交汇最频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使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在这里充分交融和传播，形成了多元、包容、厚重的地域文化，积淀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泾川以“王母故里”而驰名华人圈，又以佛教胜地而享誉海内外，先后有 12 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泾州佛事。自 1964 年以来，半个世纪内泾川先后三次出土佛舍利。这不仅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堪称“泾川奇迹”，也是泾川佛教文化的“品牌”。

近年来，泾川越来越多的佛教文物的发现，使人们对泾川有了新认识。境内现存、发现和出土的舍利塔遗址、佛舍利、石窟、佛像等佛教文化遗存有 1500 多处。以大云寺地宫和南石窟寺为代表的一系列佛教实物，对研究该区域佛教文化的历史沿革及相关情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郭沫若曾说“舍利石函，贵在石函”。学者们称赞泾川是“中华第一佛宝地宫”。

即将付梓的《泾川佛教文化论》，是泾川县委、县政府重视佛教文化保护和研究的结晶。该书在对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佛教金石文物、佛教碑铭文献记载论述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上的舍利崇拜问题进行分析，对佛教舍利供奉及流转脉络进行考察，对佛教思想发展的演变进行梳理，较为完

整地反映出泾川乃至整个陇东地区佛教发展的脉络,是泾川佛教兴衰的见证作品,为泾川作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研究中心”提供了理论参考。它的出版对进一步加强泾川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以及推动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泾川处于重要位置,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从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起步,充分认识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以此为基础,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做到传承创新,永续发展。“心中若有菩提净,满眼便是十万佛”。我们坚信,有如此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有如此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如此勤劳智慧的泾川人民共同努力,泾川必将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实现“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宏伟蓝图,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谱写重要篇章。

是为序。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连辑)

序二：从泾川出土佛像舍利等文物 看古代泾州佛教盛况

泾川古代曾为泾州，处在连通东西方各国的丝绸之路东端、接近国都长安的要冲地段，是泾河流域拥有悠久历史的军事重镇和政治文化中心。丝绸之路既是沟通中外经济物资交流的贸易之路，也是连接各国政治外交使节来往之路，又是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之路，自然也是中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之路。

泾州紧靠千年古都长安，南北朝时在北魏统辖之下。北魏早期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吸收汉文化，既发展儒家文教又扶持佛教传播，寺院信众很多。北魏早期，在平城已经建造了云冈石窟，雕造了很多精美的佛像。迁都洛阳后，又在龙门建造庞大的佛教石窟。至北魏后期，在北方逐渐形成东西两个政治中心：东魏和北齐的都城在邺（今河北临彰西南），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长安。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继续以长安为都。在古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

因为泾州是地处长安西边的门户，地位很重要，不像现在泾川属于平凉管辖这么简单。在北魏时，平凉县归泾州管辖。泾州管辖的范围曾经很大。西魏在泾州设府，治所在安定县，辖泾州、邠州、盐州、灵州、显州、云州。北魏时期泾州也建造佛教石窟，有王母宫石窟寺、南石窟寺、罗汉洞石窟等，此外还有稍后属于北周时期的宝宁寺佛舍利，都反映了泾州佛教盛况。从风格看，有专家论证说，它们带有云冈石窟的风格。这些造像

的工匠随着政治中心迁移而走,哪里有佛教就向哪里流动,所以佛像的风格跟佛教的传播活动有很大关系。

北魏以后,佛教在涇州十分盛行。这从现存佛教石窟、造像和文物可以得到证明。第一个亮点反映在现存北魏涇州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造像方面。很多造型迄今没有遭到太大破坏,保存比较完整,色彩也好。不管作为佛教文化遗产,还是人文资源,都是今后应予开发利用的好资源。第二个亮点是隋文帝仁寿年间向全国各州分送舍利之盛举在这里也有实物证明。据我考察,隋文帝从仁寿元年(604)到仁寿四年(604)先后三次派多位沙门、官员向全国 113 个州送去舍利,命各州在规定的期限内建立供奉舍利的塔,共建塔 111 座(隋有 190 个州);塔建成后在同一个时间由州县官员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并为皇帝百官、国民祈福。涇州大兴国寺也受赐舍利建塔供养。涇州是朝廷第一批向 30 个州奉送舍利之州的第 14 个。遗憾的是,没有考证出当时向涇州奉送舍利的使者名字。但是,涇州供奉舍利呈现感应瑞兆的情况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隋仁寿舍利感应录》中是有记载的:据说由三处提供的三块石头恰好组成了石函。现存石函上没有“大兴国寺”字样,那么凭什么说大云寺的舍利是隋文帝使者送大兴国寺的呢?对此,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考证。然而,却不能说没有相关证据。

隋朝大兴国寺的来源在全国是统一的,是有史书记载的。隋文帝杨坚生于寺院,其父杨忠委托智仙尼抚养,直至 13 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认为自己能当皇帝是得到佛的佑助,建隋之后重新恢复因北周灭佛政策而衰微的佛教。他把即位前从一位印度僧人那里得到的一包佛舍利(佛骨粉粒),在分三批向各州奉送舍利过程中,吩咐在出生的寺院和当皇帝之前到过的 45 个州皆建“大兴国寺”供奉(《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所以,涇川建大兴国寺说明隋文帝曾到过此州。1964 年在涇川大云寺址发现舍利中的一批,就是当年大兴国寺供奉的舍利,铭文写有“大周涇州大云寺舍利之函一十四粒”。记载的年号、舍利

数字是全国最准确的,全国再没有第二个。像北京房山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有石函铭文记载是隋文帝舍利;辽宁朝阳北塔佛舍利,碑刻铭文记载是隋文帝舍利。这些记载,都没有泾川大云寺舍利记载得详细。唐武周时代发现隋泾州大兴国寺舍利的时候,正处于武则天大兴佛教的时候。武则天认为她当皇帝是得到了佛菩萨的保佑。佛经《大云经》有女人可以当国王的内容,对她当皇帝可作思想上、舆论上的支持。所以,她建周之后在各地建大云寺。其中,有的寺院是新建的,有的是在原有寺院基础上改建的。泾州是在大兴国寺原址改建大云寺的时候,发现了隋文帝分送的舍利,有石函、琉璃瓶。这种瘞埋方式恰恰是隋文帝定下来的。当时,隋文帝在全国 111 个州安葬舍利的方法,都是用石函、琉璃瓶安置舍利的。

随着佛教社会地位的迅速上升,武则天已把到法门寺迎奉佛骨舍利的事情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法门寺是唐朝的准皇家寺院。唐高祖李渊(566—635)在隋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反隋,十一月率兵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自以“大丞相”、“唐王”名义总揽朝政。翌年(618),李渊废隋建唐,即位称帝,改元“武德”。在李渊以隋朝宰相名义执政的时候,就对法门寺进行了修缮。因为这个关系,唐朝历代皇帝对法门寺都另眼看待。唐高宗崇信佛教,于 659 年开创了开启法门寺地宫迎佛骨舍利到东都洛阳皇宫内供奉的先河。这是唐代第一次迎奉佛指舍利。此时,武则天已经干预政治了。武则天随后又迎奉了法门寺舍利,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都效仿皇室,盛行供奉舍利。所以,武则天时代泾州发现隋文帝分送的舍利,就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安葬,那就是石函、铜匣、银椁、金棺、还有琉璃瓶。现在辽宁省朝阳市发现的辽代重修北塔所奉隋文帝舍利,也是这种安葬方式。应当说,在全国是泾川最早发现用这种方法安葬的,而且安葬的是隋文帝赐的舍利。因此,这批舍利很重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的价值。

那么,泾州的大云寺和龙兴寺是什么关系呢?它们都是朝廷敕建的

州级寺院。武则天临终前将皇位让给其子唐中宗,朝廷遂命各地将大云寺更名为“中兴寺”,后来又更名为“龙兴寺”,到唐玄宗时候又改名“开元寺”。然而,有的寺院并没有改过来,仍称龙兴寺。因此,可以说,涪川大云寺和持续至宋朝的龙兴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为什么龙兴寺舍利是在大云寺的旁边发现的呢?可以想象,那时候大云寺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个地段是在它范围之内的。

2012年年底,涪川大云寺遗址发现窖藏佛像。佛像头部都很精美,然而造型很少是保持完整的。原因何在呢?我考虑,可能跟唐武宗灭佛有关系。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推行大规模的毁禁佛教的政策,命僧尼年40以下者、无祠部所发度牒者还俗,最后又命年50以下者及一切未获特许保留僧籍的僧尼还俗,还俗一律遣归本籍。七月,敕“并省”(合并、减除)天下佛寺,长安和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各地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僧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其他的僧尼及大秦穆护(或谓是祇教祭司)、祇僧皆必还俗;凡拆毁的寺庙的材物充公,用铜像和钟磬等铸钱,钱像用来铸农具,金银像应上缴;财货田产一律由官府没收。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万人;拆毁属于私寺(无寺额者)招提、兰若4万余所。寺院中的各种佛菩萨像自然也遭到了破坏。佛像在僧人心中是很神圣的,是佛菩萨的象征。估计在当时直至宋代,僧人将在周边寺院和大云寺收集到的被破坏的佛像挖地窖予以埋葬。因此,当前出土的佛像很少有完整的。如果认为这是战争的原因,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参加战争的双方将帅士兵都信佛教,毁坏佛像对他们没有实际利益。如果说是因起火烧毁的,那就应该发现有火烧的痕迹。既然没有火烧的痕迹,就可以推测是人为破坏的。

关于舍利问题,这里顺便再说几句。崇奉佛舍利是佛菩萨信仰的一种形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实现社会中,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宗教现象。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佛教文化遗物,正确奉行宗教政策,就要

求我们应尊重古人和现代人的这种信仰。凡是有历史记载确实存在过的佛舍利,我们就应当将其看作古人信仰过的,应予尊重。况且佛教经典提到,信众为了信仰需要,可以把玛瑙、贝壳作为佛舍利来供养。密宗以“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代表大日如来之体、佛的宇宙法身之体,看作诸法缘起之根源,认为至诸佛、下至一切有情及器世间都是六大之所形成。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泾川发现的宋代舍利是佛舍利呢?这批发现的宋代舍利反映的是基层民间的舍利信仰,级别不是很高,总数两千多粒,而且是用瓦棺安葬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泾州民间舍利供奉的情况。对此,我们没有必要贬低或抬高,因为佛舍利的供养在佛教界被认为就是佛真身供养。

最后,想顺便提出一个建议。泾川可将出土的窖藏佛像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不要做修复工作。对有的造型很好的佛像,可以按照现在的工艺、原来的比例,原样复制出来。将旧的做文物,新的做展览。对这批文化遗产如果泾川不复制继承,别人就可能仿制。

泾川县委县政府对保护和开发当地历史人文资源十分重视,在陆续发现佛舍利、大量佛像和其他佛教文物之后,组织专人并联合各地学者进行考察和研究。2013年12月26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我应请作大会发言。会后,他们组织专人将会上发表的论文编为《泾川佛教文化论》,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县里负责同志来电约我为此书写序。笔者对此既不能推辞,又感到时间紧迫,不得已便将原来大会发言记录稿重新核对和修改加工,谨以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杨曾文)

序三：让泾川佛教文化大放异彩

去年年底，我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甘肃泾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北京召开的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正是这次研讨会，使我对泾川佛教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厚重历史积淀，乃至在整个华夏文明建构中的分量。

泾川位于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佛教文化十分兴盛。早有学者把丝绸之路甘肃境内的两颗佛教文化明珠，誉之为“西有敦煌、东有泾川”。在泾川历史上，先后有 12 位帝王下诏或敕赐兴办佛事。泾川境内现已发现和出土的舍利塔遗址、佛舍利、石窟、佛像等佛教文化遗址达 1500 多处。

自 1964 年以来，泾川境内先后三次出土佛舍利。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堪称“泾川奇迹”。而 2013 年年初发现的北魏、隋、唐时期大量的佛像窖藏，更被国内学术界一致认定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又，在泾川境内，自东至西，延绵一百余里，开凿有众多的佛教石窟造像，被称为“百里石窟长廊”。这些石窟的开凿至迟在北魏时已成型，现存窟龕有 600 多个，而保存较为完整的造像有 400 多尊。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佛教文化艺术财富。

除此之外，泾川还有一批数量众多的佛教金石文物。这些金石文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不仅为人们呈现出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人们研究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提供了便利。如，

大云寺地宫出土的最早将中原传统棺槨葬制引入佛舍利的贮藏规制，即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涪川的佛教文化历史，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专题研究，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围绕涪川佛教文化的价值、意义、保护、研究、利用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研讨，使涪川在佛教文化发展历史中的地位重新得以彰显。涪川县有关部门将近年来国内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准备出版。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关心涪川佛教文化历史，研究涪川佛教文化历史，把涪川佛教文化历史展现给国人和世界，让丝绸之路上的这颗明珠重新发出它的璀璨光辉！

（北京大学教授 楼宇烈）

目 录

序一：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泾川佛教文化论	(1)
序二：从泾川出土佛像舍利等文物看古代泾州佛教盛况	(3)
序三：让泾川佛教文化大放异彩	(8)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刍议	方立天(1)
唐朝佛教与甘肃泾川佛寺遗址出土佛像等文物	杨曾文(5)
对泾川的佛教文化资源的两点建议	楼宇烈(12)
浅谈泾州龙兴寺及其舍利	黄夏年(15)
思考如何保护继承挖掘泾川佛教文化	嘉木扬·凯朝(26)
佛教的社会文化意义	周贵华(35)
重视泾川文化遗产,开展佛教舍利研究	姚卫群(47)
丝路佛光 盛世再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泾川佛教文化思考	温金玉(56)
从《法宝东流因缘》看泾川舍利	徐文明(69)
武则天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崇敬	韩金科(73)
对泾川佛教文化的一点认识	杜斗城(85)
泾川佛教文化与庆阳北石窟寺关系初探	宋文玉(93)
平凉佛教传入及泾川佛教文化中心地位的	
确立	魏柏树 张连举(113)
泾川大云寺的佛教文化意蕴与旅游文化的契机理念	王知三(120)

佛舍利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李利安(125)
从泾州大云寺谈中国舍利塔基地宫的发展演变过程	
——兼论隋仁寿所立寺塔	刘志华 张正新(140)
隋文帝的佛教信仰及其政策论略	杨维中(152)
元魏胡太后与泾川石窟寺群	薛宗正(169)
大云寺、大云经、女皇帝武则天与泾川大云寺复建因缘 ...	王宝库(176)
论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的历史必然性	王金生(180)
大云寺文化产业园应成为泾川佛教文化的研究中心	刘玉林(184)
从长安到原州	
——以庆阳北石窟寺为例	于 春(192)
古泾州地区的舍利瘞埋活动略论	冉万里(204)
舍利崇拜的历史反思与舍利传承问题探讨	汪海波(220)
佛教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与有关舍利瘞埋的石刻	赵 超(230)
舍利文化的功能分析	习细平(237)
泾川佛教遗址简介	吴 荭(246)
《甘肃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发表前后	董玉祥(254)
结语:让丝路佛都再造辉煌	(258)
附录一 甘肃省泾川县佛教文化遗存与发现	
情况介绍	泾川县佛教文化研究会(264)
附录二 郭沫若让铜奔马奔向世界	汪晓萍(285)
附录三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	王 珏(290)
附录四 武周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文	(唐)孟诜(292)
附录五 泾川佛教文化专家再发现	尚德琪(294)

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刍议^①

中国人民大学 方立天

泾川佛教文化的特点是历史久、舍利多、石窟长廊长、文化价值高,这些特点足以支撑“西有敦煌,东有泾川”这个观点。

一、从泾川历史和地理结合的视角看, 泾川佛教十分兴盛

看了有关资料,基本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泾川为古代中国文化的重镇,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很好。气候温和、雨量适中、物产丰富,号称陇东粮仓。这些为佛教文化兴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条件。泾河两岸石质山岩上适宜开凿佛教石窟,这个自然条件也很重要。因而,自然条件的优越、物质条件的丰富是泾川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地理区位优势利于佛教的传播。泾川是甘肃的东大门,距离西安仅两百多公里,可以说是西安的西大门,是古丝绸之路必经的东段中线和北线交汇点,是西出长安的第一站,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点,是佛教自印度、西域传入内地的孔道。这些为佛教重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条件。三是政治地理因素。泾川位于政治中心长安的周边,

^①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的“甘肃泾川佛教文化研讨会”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核同意。

周秦汉唐以来的心脏——关中地区的上游,前秦、北魏、西魏、隋、唐时期统治者推崇佛教的政策,很快就传播到泾川等地,对泾川佛教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四是泾川是中国多民族交汇最为频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据了解,现在泾川还有完颜部落,共两千多人,是完整的金代完颜皇室后裔。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等教义,成为维系民族了解、友谊、团结的纽带,这种互动交流也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是对泾川佛教文化之所以兴盛的一点思考。

二、关于泾川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色

泾川佛教文化遗产很多,有 1500 多处,大体有五个方面的类型:一是佛舍利,包括佛牙、佛骨,一共出土了三批。如何看待佛舍利,目前这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第三次发现的诸佛舍利数量很多,是不是释迦牟尼的呢?那也不一定。我们不需要去考证它是谁的舍利,反正是佛教舍利,至少是当地高僧的舍利。因为高僧也是佛,众生觉悟了就是佛,所以数量问题不需要去探讨。佛舍利是一种信仰文化,在信徒的眼中很重要。舍利是信徒崇拜的外相,是佛的、高僧肉体的体现,是信仰的内相。郭沫若先生参观 1964 年出土的大云寺佛舍利后,指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这一观点单从科学、艺术角度讲,是有道理的,但从佛教方面来说,很不全面。对佛教徒来说,石函只是装舍利的器物,舍利才是最神圣的,在信徒的心中才最重要。可以看到,佛舍利、佛指骨在台湾、香港、韩国引起很大轰动,全台湾四百多万人跪拜。这一现象发生在 21 世纪,已经映证了佛舍利强大的信仰力量,所以宗教信仰的事情比较复杂,各方面也比较慎重。总之,佛舍利作为一种信仰的内相和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由此,可以说,泾川三次发现佛舍利是泾川佛教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泾川区别于敦煌、张掖、麦积山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有佛窟、佛龕六百多个,极为壮观。这也充分佐证了佛教在泾川的

兴盛历史。三是泾川佛教的造像有铜像、石像、泥像 436 尊,数量相当多,且质地不同。四是泾川的佛教碑铭有砖造的、石造的、铁造的,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均不言而喻。五是泾川历史上的寺庙很多,目前还有几十处,分布在各个乡镇村落,对这些寺庙进行适当的恢复极为重要。除了佛教文化之外,还要对道教及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甚至将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与佛教结合起来,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适当恢复,也很重要。

三、对泾川佛教文化开发利用的建议

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在指导思想方面,要先恢复寺院遗址、充实佛教文化内涵,再发挥积极作用。要有由重点到一般、由容易到困难、由近到远的整体规划,既有近期重点,也有远期目标,尤其是规划必须反复论证,作成精品。在工作思路方面,建议适当恢复泾川佛教遗迹,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信仰需要,提高大众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增加民众凝聚力,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而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但在具体实施中一定要防止佛舍利被过度商业化,有的老板可能会承包寺院进行商业运作,那样做肯定不行。

二要进一步摸清家底。首先,泾川县佛教文化资源的重点、特点、亮点在哪里?其次,泾川文化环境方面,佛教、道教、儒教、生态环境、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之间关系是什么?肯定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泾川和周边佛教文化圣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搞清楚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和周边佛教文化圣地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做到互动、互帮、互助,相得益彰,发挥更大作用。

三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阐扬佛教文物。比如,碑铭可以从书法的角度、佛像可以从美术的角度、舍利可以从信仰的角度、石函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去阐扬。阐扬这些佛教文物的文化底蕴,对于打造文化品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